



从四方面完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建设

当前,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践已经全面展开,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正在建构之中。应继续统筹保护传承利用,实现国家文化公园内核心遗产与其他文化特质的资源整合,发挥最大整体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加强中华文明传承和弘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强调“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当前,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践已经全面展开,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正在建构之中。应当立足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机制引导,对国家文化公园规划、设计、实施与运营四个过程进行思考,并提出完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的建议。

一是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编制工作推进顺利,大部分国家层面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已陆续发布,规划成果为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全新概念下的规划探索,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在诸多方面实现了突破和创新。

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例,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是规划范围和对象扩展,与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的区域深度融合。第二是在大运河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三大价值基础上,阐释了三大文化价值和四大时代精神,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国家文化公园话语体系的基本文本,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思想源泉和精神滋养。第三是建设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

融合区、传统利用区四类主体功能区,在空间规划层面对文化遗产引领区域发展进行探索。

二是国家文化公园设计。当前,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已不同程度地进入设计阶段,如何把握设计的合规性、合理性、经济性、审美性和独创性,是当前值得关注的问题。

根据设计内容和所属区位的不同,可分为标准化设计、展示型设计、创造性设计三类进行引导。其中,标准化设计适用于管控保护区内以使用功能为约束条件、需尽可能淡化自身形象的设施,如道路、栈道、平台、栏杆、围栏、监控设备等。展示型设计,适用于主题展示区内不仅具有实用的建筑或生态功能,其自身也可以作为展示对象的建筑或景观,如博物馆、展示馆、游客中心、景观绿化、广场等,应特别重视审美功能和中国特色。创造性设计,适用于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内不断创造、新产生的文化活动和生产,在已拥有大量创造性设计单项的基础上,形成与遗产保护需求相符的产业聚集。

三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有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一系列“十四五”实施方案已发布实施,为关键时期打造国家文化公园这张闪光的世界级文化名片提供了行动指南。

与规划、设计同步,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已取得丰富的实践成果。以大运河为例,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解决大运河遗产保护中长期问题、主要矛盾的综合实践,如各省、市逐步健全遗产保护

法律法规体系,大运河本体保护与考古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明显扩展,大运河本身具有的航运、水利等功能得到进一步优化,沿线水质普遍提升等。第二类是“大运河+”实践的广泛创新。大运河文化得以深度挖掘并进一步融入社区生活,大运河主题的文艺作品、文化产品不断创新产生,沿线城市间、地区间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

今后的建设实施应继续统筹保护传承利用,实现国家文化公园内核心遗产与其他文化特质的资源整合、发挥最大整体价值。

四是国家文化公园运营。在规划、设计、实施已取得诸多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下一阶段对运营予以更多的重视,即如何“用好国家文化公园”,把“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品牌价值的实现作为国家文化公园价值实现理想状态。国家层面应设置一套科学完善的通用指标体系,既能为国家文化公园区域绩效考核提供依据,也可以指明国家文化公园价值实现的现状与理想状态的差距。

指标体系可从以下三方面考虑:文化价值方面,评估国家文化公园带给人们的归属感、历史感、信赖感、尊重感以及对“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认同程度。国家文化公园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程度方面,可以结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指标体系进行设置。品牌优势方面,评估财政经费支持水平、社会资本投入水平、公园区域内文化整合程度的变化情况、公园区域内各类社会生产的

超额价值等。

综上所述,围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编制完成的一系列规划和已经取得的实践成果,表明了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抓手,推进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一个战略性思路。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要求,需进行以下几点:

一是确立国家文化公园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机制,为重大任务、重大工程、重大措施的组织实施提供保障。

二是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国家层面推动制定出台国家文化公园条例,加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管理。设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工作综合考核评价制度,加强跟踪监测和阶段性评估。搭建公众参与平台,接受社会监督。

三是探索创新发挥中国制度特色和优势的文化遗产地治理模式。基于国家文化公园,设立国家重大遗产试点,探索实行央地共建政策,开展文化遗产及其附着土地资产确权、国家保护监测研究中心建设,推进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遗产地治理。

四是制定国家文化公园名录策略,建立警示和退出机制,实施预备名录项目动态管理。

五是深化国家文化公园价值研究,通过国家文化公园塑造中国文化的整体形象,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公园话语体系。(赵云)

甘肃:博物馆里畅享新春文化大餐

□ 本报记者 庞国雄



2023 春节期间,甘肃省各级各类博物馆紧紧围绕“兔年新春”的节日主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精心策划开展了各具特色的贺岁展览、热闹非凡的非遗展演、五彩缤纷的新春灯会和内容丰富的线上直播互动等社会教育主题活动近 1000 项,将近 50 万人次走进博物馆,参与、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知文物中蕴藏的丰富内涵。

敦煌研究院联合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借助数字技术共同推出“千年营造——敦煌建筑之美在线展”,全方位呈现了敦煌建筑艺术的博大精深与精美绝伦;甘肃省博物馆推出“大展宏‘兔’——兔卯(兔年)新春生肖文物图片联展”“二玄社复制作品展”“甘肃省国际友城工作 40 周年图片展”“战国戎人‘豪车’展”“忠诚守护 使命担当——甘肃省打击文物犯罪成就展”等 5 个新春系列展览,群英荟萃,系统展现了甘肃地域文化的深厚;平凉市博物馆“大原戎风——固原北方青铜文化特展”,天水市博物馆“墨韵养正——张海燕书画艺术馆馆藏名家作品邀请展”,白银市博物馆“陇右通衢——文物精品交流展”,武威市博物馆“大道依旧——五凉文化展”,酒泉市博物馆“契约中国——马鞍山市博物馆馆藏契约展”,肃北县博物馆“悠悠乡愁见真情 不忘初心跟党走”旧照图片展,高台县博物馆“泉踪币语——东西方古代钱币精品展”等展览内容丰富,主题突出、形式多样,为观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写福字、剪窗花、绘长卷、挂灯笼……各类主题社教活动丰富多彩,秦腔、锣鼓、晚会、社火……新春活动热闹非凡。节日期间,各博物馆围绕“观展+体验”策划开展了 500 多场次有声有色、可看可玩的社教活动。敦煌研究院推出冬季限定“飞天”路线,打卡兔年元素,供游客欢度春节;甘肃省博物馆开展“春节七天乐‘兔’然遇见你”系列活动,邀您在博物馆里喜迎新春;平凉市博物馆推出“兔发奇想聚博”系列线下主题社教活动,让孩子们深刻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天水市博物馆策划推出

23 项新春系列活动,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兰州市博物馆“大明风华·我们的节日·汉服集市”主题社教活动,让参与的观众“玩”了一把穿越;武威市雷台汉文化博物馆的非遗展演和舞狮,让兔年新春“火”了起来。各类主题活动的开展,以“深度游”的方式不断地吸引观众走进博物馆,开启了别具一格的新春文化之旅。

春节期间,各类新技术助力博物馆成为创新基地。敦煌研究院推出系列短视频《云赏敦煌》,让大家相约“云端”,身临其境感受敦煌艺术;莫高窟官方虚拟人伽罗携手青年舞蹈家华宵一为大家带来 XR 舞蹈秀《梦回敦煌》的表演;甘肃省博物馆参加百强博物馆“新春大直播”,再现“大道依旧——五凉文化展”;平凉市博物馆各色线上互动活动层出不穷,还有好礼相送;敦煌市博物馆推出“玉兔迎春——全国博物馆兔年生肖文物联展”VR 数字展,将馆藏 7 件兔子画像砖设计到联展中,让人足不出户,共享文博大餐。全省各博物馆开展线上活动 300 余项,吸引了大量观众在线互动和观看,让观众在互动体验中了解历史,让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生活。

春节期间,甘肃各博物馆纷纷加入“国潮”文化大比拼,各馆相继发布了兔年系列文创新品。敦煌研究院推出兔年敦煌壁画和兔年专属限定文创,祝福大家兔年“兔”大展;甘肃省博物馆联合抖音电商亮相“文创年货节”,让更多人在品味浓浓年味的同时,领略传统文化之美;敦煌市博物馆联合搜狐文化推出“如果文博会说话 1 敦煌博物馆兔年文创在线推选”投票活动,对兔年上新的精美文创产品进行投票推广,将各类贴近人民生活的产品赋予文化内涵,既增加了观众的体验感,又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得到了消费者的普遍认同。

近年来,甘肃省文物局积极组织开展“到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活动,全省各博物馆积极响应,为观众提供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数量众多的优质文化盛宴,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喜爱,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人民日报海外版点赞兰州保护黄河文化

记者从甘肃省兰州市政府获悉:当地制定出台《兰州市黄河文化保护办法》,于 2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该办法对兰州市黄河文化资源进行界定和分类,明确部门职责,确立基本保护制度,对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工作制定了具体措施。同时突出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如打造黄河古镇、金城关黄河文化旅游示范区、黄河楼、兰州老街、兰州水墨丹霞、读者印象精品街区等具有兰州黄河文化特色的旅游项目,定期举办黄河文化旅游节、黄河母亲节、黄河风情文化周等活动,加大对兰州黄河大水车、羊皮筏子、兰州太平鼓、兰州刻葫芦、高跷等黄河文化遗产的传承弘扬。

甘肃广电总台 视听甘肃 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从敦煌文物中看“兔”文化

在敦煌莫高窟第 407 窟窟顶藻井上有一副“三兔共耳”图案,三只兔子首尾相连、循环往复、姿态灵动、彼此追随,寓意着吉祥圆满、生生不息。这样的图案在敦煌博物馆大厅顶部也有一幅,它们遥相呼应,共同讲述着千百年来敦煌文物中的“兔”文化。

甘肃广电总台 视听甘肃 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 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 数千年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 5100 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落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畝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 1958 年,1984—1986 年和 1994—1996 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 600 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 9 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氛。

数千年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 40 米见方,现存还有 5~7 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 20 米、深约 10 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 2~4 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与其他沟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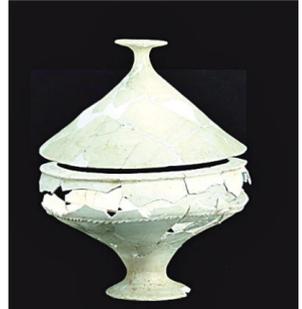


“宫城”祭祀区碳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池沼连通的、有实用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 20 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 5 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在 75 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 5000 人工作 1 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城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 55 米、南北长约 67 米,面积在 3600 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 15 米、深 10 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 8000 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 700 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 1.5 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 3.2 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平整,窄处宽 1~1.5 米,最宽处可达 5 米,现存高度 1.5~3.5 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沟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罐

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陶瓶

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等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陶、白泥堆纹陶,涂朱朱砂的玉钺、骨钺,以及大量碳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制作工艺还是个谜。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 1000℃ 以上,最高达 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 700~1000℃ 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碳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碳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应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韩建业)